



日本農業教育

(资料选译)

刘伯彦 陈 确 高福余 等译

《高等农业教育》杂志编辑部

前 言

日本在明治时期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濒于崩溃的状态下得到了奇迹般的恢复和发展，其“秘密”在哪里？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无论是明治时代也好，还是战后也好，教育给与日本人以巨大的力量”，“教育在现代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成了战后复兴的力量”。由此可见，“秘密”也就不复存在了。振兴经济，关键在科学，基础在教育。

我们国家在经历十年内乱之后，正在全力地整治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一系列战略性的改革，已经和正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要求教育要适应于新的形势，因此，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迎接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本着“洋为中用”、借鉴外国有益经验的精神，组织了一些有关教育工作者和教师编译了《日本农业教育》这本小册子，分十五个专题介绍了日本有关农业教育的发展历史、现状及今后发展趋势，日本农业现代化与农业教育改革，以及某些大学的招生、考试和毕业生去向等情况。可供各级领导、教育管理部门、研究部门和各类农业院校教育工作者参考。

由于受到编译水平和时间、资料的限制，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高等农业教育》编辑部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目 录

一、明治时间的农业教育	1
二、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农业教育	6
三、战后新制大学的起步和高等农业教育改革	12
四、农业现代化和高等农业教育改革	20
五、农业教育的现状和课题	27
1. 岩手大学的现状和课题	
2. 山形大学的现状和课题	
3. 滋贺县立短期大学农业教育的现状	
六、东京大学农业部的发展方向	43
七、农业教育的现状和毕业生的出路	47
八、《产业教育振兴法》的制定和基本观点	59
九、农民学习运动和农民大学	66
十、国立公立大学考试的改革	74
十一、关于国立公立大学考试的改革	77
十二、筑波大学的招生办法及其改革	80
十三、推荐入学的现状和问题	85
十四、欧美各国和日本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比较	95
十五、日本今后的农业教育	104

明治时期的高等农业教育

明治维新伊始，随即尽力发展初等普及教育，同时以培养新的领导层为急务，乃着手创办高等教育机构。特别是明治初年，主要以士族授产为目的的开垦为重要国策。此外，从外国引进农具、作物、果树、家畜等，以谋求农事的改良也成了重大课题。因此，对新的农业教育的要求，是从对士族授产和引进洋式农法的关心开始，并以创办高等教育机构为线索，设置了农业试验场和传习所。

1872年（明治5年）由北海道开拓使在东京芝的增上寺设立了“临时学校”，为开拓使的需要进行了农业教育。这是我国农业学校的起原，比1802年德国人AlbrechtThaer（1782—1828）于策勒设立的农业学校晚70年。

在创建北海道开拓使临时学校的1872年10月在东京内藤新宿9.5万坪（注）的土地上由内务省劝业寮设置了实验场。这是政府对从国内外收集的作物、果树等进行试作、繁殖其种苗，以向全国分配为目的的设施。1874年，在内务省劝业寮内藤新宿办事处设置了农学业务员，负责收集农产品，进行农业实验等，同时进行“农业生”的教育。这是根据《内务省劝业寮事务章程》第八条设置的，于1877年1月，又根据本法在内藤新宿创立了“农事修学场”。同时12月便迁往驹场，

（注）日本土地面积单位，每坪为36平方尺。——译者

乃诞生了驹场农学校。

这两所农学校是我国最初的农学校，均为高等专门学校，我国的农业教育以引进“洋学”为目的的两所高等专门学校为发端是非常值得瞩目的。

已如前述，我国农业教育根据劝农政策从引进洋式农法和土族授产为目的的开垦事业的需要，在内务省和开拓使厅领导下，做为比较高级的教育机构业已起步。明治初期，特别是札幌农学校和驹场农学校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两校在农业教育史上的位置前已述及，在这里以草创期的状况为主探讨一下教育内容方面的问题。

驹场农学校的筹划应从1874年4月决定在内务省劝业寮内藤新宿办事处设置农事修学场算起。1877年1月成立，2月开始授课，10月改称农学校，同年10月又迁至驹场，转年1月举行了开学式。1881年移交给农商务省农务局领导，1886年7月与东京山林学校合并，发展成东京农林学校。1890年，升格为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归文部省领导，成为农业教育的最高学府。其后，在1935年迁移到本乡以前虽然改变了名称，但占地并没有变化。战后做为新制大学，改为东京大学农学部，直至现在。

札幌农学校是从1872年（明治5年）于东京芝设置的开拓使临时学校，于1875年改名为札幌学校，不久于1876年8月在北部设置札幌农学校，是我国高等农业教育机构的开端。1886年1月，随着北海道厅的新设，从农商务省划归该厅领导，又于1895年4月，归文部省掌管。于1907年6月改称为东北帝国大学农科大学，并以此为主体创办了北海道帝国大学（1918年），发展为北海道大学。

两校对日本现代农学和农业教育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今天农业教育问题发生的端绪。

驹场农学校成立时，学生的教育根据当时的《农事修学场入学规则》（1876年5月制定），其要点如下：（1）指出我国原来的农事“缺乏学理”，是专门依靠经验和技能的因袭技术；（2）这样，为了振兴日本农业，“技术和学理”必须相辅相行；（3）为此，以“欧美诸国为楷模”学习农学乃当务之急。于是为了实现（2）的目的，设置了以学习农业学理为目的的预科、专门科（农学科、兽医学科）和以培养精通实际农事操作的农业技术人员的试业科。试业科的入学资格定为“拥有5段以上土地者及其子弟”，进行以“学理和技术”相结合为目的的教育。也许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农学的认识淡漠，当初的应试者名额不满，注册延期。专门科、预科做为入学资格要求的知识水平都相当高。

驹场农学校的教学内容，因当初没有专门学农的，所以，担任农学课的教师都是语言学者，不过是译讲一些英文版的作物学、农业化学、农业经济学等课程，但从1876年聘请了5名英籍教师。预科、专门科用英语讲授，由翻译官翻译，而试业科用国语（译讲）讲授。1878年1月24日在明治天皇临席之下，驹场野农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时，明治天皇把勅语和“钥匙”赐给大久保内务卿，在其勅语的开头写道：朕惟农乃国之本，物产由以殖，民生由以富，此乃不得不讲此学之所以也。”这个勅语成了现代农本主义的一个根据。另一方面，在开学典礼上天皇把钥匙赐给内务卿，再由内务卿转送给校长，这是模仿英国的仪式，是象征着把学校办成欧洲式农学校的意愿的仪式。

当时农学校的教师都是英国人。原来，英国人与德国人不同，他们不研究讲授日本的农业而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授英国的农业。甚至农产品贸易也不讲横滨、神户的贸易，而是只教伦敦、利物浦的贸易。因此，那时从札幌、驹场农学校毕业的学生只从西洋人学了一些学理，缺乏实际经验，所以，在现场很难应用。当时有人评论说“驹场的毕业生只啃了几本农学书本，是不值得信赖的”，可见一般。

用引进英国农学推动日本农业革新，这是个失策。1879年废除了聘请英籍教师的合同，接着于第二年招聘了德国人。这个时期也是“老农”的活跃期，排斥直译英国农法的纸上空谈之风很盛，驹场农学校迎来了一个学风转变期。

这些德国教师所奉行的研究方法是分析方法。他们把研究对象分解成各个要素，并且认为如果每部分都弄清楚，那么整体自然也会清楚。其理论根据是机械唯物论，认为整体不过是部分的总和。这给日本农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但这种方法当然有局限性。因为把多数个体集中在一起时，便产生了个体之间相互干扰这个新条件。而分析的方法便不能充分把握这一点。忽视这一点，把分析的方法推向极端，便会使农学逐渐与农业脱节，变成只把作物或土壤当作材料使用的与植物学和化学相同的东西。而以后日本农学就是按照这个研究方向前进的。驹场农学校的德国教师一方面对现代农学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使农业和农学脱节，留下了“农学兴、农业衰”这个后果。但在1890年升格为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大学时，仍以德国农学为基础，在没明确日本农业现状的情况下，传播了德国农学的知识。

其次，就札幌农学校的若干特色略述如下。在札幌农学

校初创期，于1876年聘请了美国人克拉克担任首席教师兼农场长。他的任职期间不过8个月，但对以后的发展却留下了有形无形的足迹。其基本思想是排出浅薄的技艺和普通的修业，建设成与名实相称的永远起重要作用的农学校。就是说，在避开开拓和农学校简单结合而从一个新“高度”重新结合方面是具有特色的。

第一个特征是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思想教育，即灌输尊重学生自由和进取心的基督教开拓者精神。对开拓事业必需的科目，用理论和实际的方法进行讲授。其中，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并列，还安排了相当份量的英国文学史（第三年级）、心理学（第四年级）等的人文科学。

第二个特征是把美国式农法向北海道引进的农业实习，这种实习方法对清除学生的陈旧观念是有效的。在进行经济经营的试验时，不单引进美国农法，而且不断研究、修改适于北海道的农法。与驹场农学校的英籍教师不同，美籍教师根据道内的实地调查，探讨开拓中的现实课题，并使之与农学校的教育结合起来。

第三个特征是为使开拓与国防结合的军训。根据当时的教学计划，从1年到4年每周都按排两节军训。

1882年开拓使被废除，以美籍教师为中心的札幌农学校归农商务省领导时处于转折时期。于1886年确定了以本国教师代替外籍教师的方针。

在授业科目的设置方面，也加强了对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倾向的批判，与1876年比较，减少了英语学科，增加了和汉学。在新设科目中，有日本农学、历史、农业经济、山林学、昆虫学、农政、地方制度等，明显地偏于应用科学。还

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农业教育

在大正初期（1910—1920年）必须大书特书的是中等农业学校和高等农业教育机构的“量的扩大”。这一时期，不仅学校在升格，而且学生数也在成倍地增加。过去只设农业科一科的增设了一些学科，这也是学校规模扩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1923年（大正11年）由于废止了郡的建制，多数学校由过去的郡立、町村立等改为县立。由于县的接管，不仅对学校数和学员数进行了调整，而在质量方面也得到了提高。

在这个时期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扩建显著，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时，进入真正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建立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工业技术乃当务之急。为了解决这方面的课题，整顿和扩充像欧美各国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技术革新时期所创办的各种研究所和高等技术教育机构是完全必要的。1919年的第41次议会提出了“关于支付高等学校创办扩建费的法案”，据此，在1924年以前高

有，在1889年前后出现了由美国农学转向德国农学的苗头。划归文部省领导是1895年4月，这以后，克拉克精神的“自由与进取”的风气逐渐消失。排出了脱离实际的欧美学术，重视了皇学（和汉学）的讲授，反映了当时的国情。

译自《日本农业教育史》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1年版
刘伯彦摘译

等农林学校得到了迅速扩充。新设的有九州帝国大学农学部（1920年8月）鸟取高等农林学校（1920年11月）、三重高等农林学校（1921年12月）、宇都宫高等农林学校（1922年10月）、京都帝国大学农学部（1923年11月）、岐阜高等农林学校（1923年12月）、宫崎高等农林学校（1924年9月），共7校。再加上原有的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盛岗、鹿儿岛各高等农林学校、上田蚕丝专门学校、东京、京都各高等蚕丝学校、千叶高等园艺学校、东京农业大学（私立）、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附属农业教员养成所，实业专门学校和大学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大为扩充。但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回农村的较少，大部分到官厅、团体、公司就职。此外，从这时起，从农业学校到专门学校升学相当困难，普通中学毕业生的入学者占绝对优势。

随着农业院校和毕业生的增加，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以下揭示的事项是1926年全国农业院校校长会议的决议，成了了解当时农业教育状况和问题的线索。

- （1）充分致力于农业精神的陶冶；
- （2）整理专业课程的科目，更加重视基础理论；
- （3）鉴于地方的农业状况，将专业课程的部分科目改为选修课，以便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4）更加重视农业经营学科和实习；
- （5）充实农业机械设备，熟悉其管理；
- （6）更注重适合地方的农产品加工及其他副业生产实习；
- （7）更努力于举办讲习班、做学术报告和现场指导等校外活动；

- (8) 更紧密地与各种农业机关联系；
- (9) 增设农业学校，力图普及农业教育；
- (10) 设置适于农村女子的农业教育机构。

为了彻底实现以上事项，真正发挥农业教育的作用，为了配备优秀教师和充实设备，会议要求当局采取有力措施，支付相当数额的教育经费。

在昭和初期，192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也使日本农业发生了严重的农业危机，并一直延续到1937年前后。

在这次危机中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害怕农民左倾的政府，一方面，对工人运动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另方面对农业、农民采取怀柔的救济政策。做为有效的精神支柱，就是宣扬农本主义，同时推行农村经济更生计划。由文部省、内务省确立的“教化总动员”体制(1929年)和由农林省发动的“自力更生运动”(1932年)规定了当时农业、农村教育的本质。

“教化总动员”和“经济更生运动”，做为“道德与经济的一体化”给学校教育带来很大的影响。

第一，培养人才的目标反映经济更生运动，调强“自主”“自立”“互助”精神。在学校，着重讲授毕业后马上能发挥作用的技术，而且一般在午后进行实习。农事操作一多，则整天实习，随着学校的发展，农场的规模也在扩大。对实习的重视，也是对过去的教育观念的一个否定，由于强调这种实习主义的农业教育，以致有的学校全校教职工都参加实习，甚至教英语、数学的老师也都到农场去参加实习，意思是说农场的经营必须由师生共同劳动。个别学校还规定教师必须由受过农业专门教育的人来担任。这种实习主义虽然在田间锻

炼了学生，但对其生产实践很少给以科学指导和理论根据。

此外做为克服不景气的对策把工业引进农村，发展了谷物加工、酱油酿造等的农产加工业，打开了教育的新局面。

总之，三十年代的教育以教育的地方化、实际化为中心，付出了相当的努力。

对战后的农业高中教育改革留下了一个大的累赘，即从根本上歪曲农业教育的“农场收益还原金制度”。这是从二十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财政恶化，农业学校实行教育经费独立核算制而来的。例如，千叶县于1932年（昭和7年）12月制定了《县立农学校特别会计管理规则》，过去，“农业教育费”做为一般会计的教育费来管理，而从1933年起，根据上述规则，即做为独立的特别会计进行了管理。农业学校与其他学校不同，由于农场实习有很多收入，而且当时由于强调“劳动”和“实践”，也认为根据特别会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制为宜。但这种制度的引进和推行却成了农业学校经营上收入第一主义的不良传统的开端。

第二，1920年以来，政府面对着“反体制运动”的高涨，加强了思想统治的对策，为此，于1929年8月发起了教化总动员运动，向全国推进。教化总动员以“明彻国体观念，振作国民精神”和“改善经济生活，培养国力”为两个主要目标。各町村制定了教化总动员实施要纲，在各地应运诞生了“以实践报德精神为基调的教化村”。在教化村制定了村规，以道德和经济为一体的理想乡土的建设便成了当时农村教育的重要课题。于1933年7月4日，在县教育团体联合会的领导下，专门召开了建设教化村的会议，把这一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之，在二十年代的教育思想界，一方面是人格主义、

文化主义和国家教育思想的勃兴；另一方面是以“大正民主”为基调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自由主义倡导的社会改造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扩大。然而，政府却以世界经济危机为契机，把这些“坏思想”压制了下去。与国粹主义的抬头相反，自由主义的教育思想不得已后退下来。即自由主义转向皇道主义、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基本方向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时候。

1937年12月设置的教育审议会，对确立法西斯主义教育理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把教育完全纳入了战时体制的轨道。进入昭和时期以来军国主义教育的加强，在学校教育方面主要通过向学校配备陆军现役将校以加强教练和设置以青年工人为对象的青年训练所来贯彻。然而，在世界经济危机和日本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日益深刻的情况下，面对着苦难生活的农民和工人斗争的高涨以及与之相呼应的知识份子倾向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种种动向，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于是政府又进一步加强了“思想引导”和“思想高压”的两面手法。

教育审议会确认了教学也要以国体和日本精神为基础，成立了所谓“皇国教学”的体制。教育审议会设立后，一直到1941年10月解散这个期间，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和教育财政这五方面，根据各种重要的建议和咨询，规定了战时教育的方向。

1937年前后，正面临着战略物资缺乏、劳力不足和财政的困难。在战争体制下，加强经济的重组和统制，势必对教育方针发生影响。尤其是农业学校强调了反映国策的“农业报国”精神。特别是学校的教育方针，置重点于农场实习和

军事训练，自给自足的农本主义教育重新得到了复活。

总之，我们看到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教化职能而不允许合理的、科学的、自由主义因素的存在。神秘的天皇至上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农本主义相结合，强制推行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精神，遮着眼睛不看被严重压制的农民的反抗，并继续无视独立人格的解放。众多的有“良心”的教师的实践，也不把日本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所带来的灾难，做为整体来把握，而是建立在专靠扩大侵略中国大陆的战争以解决矛盾这一根本性错误的基础上。

战后，高举铲除军国主义、超国家主义因素和残余的旗帜进行了教育改革，那么，现在应该说能够明确地把握住了教育观点和实践方法论上的课题。尤其农业教育，还可看到不少战前教育实践和观点的影响。恢复真正的教育乃是当前农业教育的课题。明治以来，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走过来的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以不断地培养“国策的执行人”为基本目标。从历史上看，教育往往变成回答国体、权力或资本的要求的精神运动，是维持制度的极为保守的东西。为了回到人类教育的原点上，并使理论真正回到教育的现场上，也应该对战前的沉重的历史经验进行重新的评价。

摘译自《日本农业教育史》农山渔村文化协会，1981年版

刘伯彦摘译

战后新制大学的起步和 高等农业教育改革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当时，全国大学、高专学生有50%以上因“学生勤劳动员”离开了学校。还在1944年，原有学校校舍就有13%遭到了战祸，全国的大学有36所化为灰烬。战后，以从战场和工厂回来的学生、教职工为中心，迈出了重建新大学的第一步。在大学里，自由主义的乃至进步的教授也重新归队，开始了民主势力的大学的活动。在这种状态下，第一次美国教育使节团于1946年3月的报告中曾劝告：高等教育不是属于少数人的，而应该为大多数人提供机会，应该确立教授经济、学术的自由等。以《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的制定等一系列新教育制度的整顿为标志的新制大学的起步是在1949年4月。

新制大学由于大学的自主管理组织教授会的设置，明确了大学自治的观念，还进一步设置了夜校和函授部，为劳动青年大幅度地打开了校门。此外，还废除了以战前的帝国大学为顶点的双轨制的学校体系，一个县设置了一所国立大学，在法制上显著地推进了高等教育的民主化和大众化。这样，可以说在观念和法制上进行了日本大学历史上的一大变革；另一方面，早在1948年初，总部的占领政策也按照法制精神向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方向转变。

此外，在新制大学起步时，有以下的困难的背景。即大学财政的困窘和设施、设备的荒废，再加上，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战后复兴的建设事业迟迟不得进展。教师、学生的经济困难、不完备的教育组织、教师不足是实现新制大学观念的巨大障碍。还有，对新制大学的新观念理解不够和摆脱旧制大学传统的困难程度也妨碍了新制大学名符其实的变革。

在这种状态的转变中，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为契机，一系列的教育倒退现象也波及大学。第二次美国教育使节团（1950年9月）提倡依靠教授会的大学自治、废止校长公选制，甚至泛美教育委员会还提出了“依靠专家和外行共同管理地方高等教育（即设置理事会案）和驱逐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教授”等的要求。

那么，在新学制下的大学，与农学有关的学部的重组又是以怎样的形态进行的呢？

1949年5月，随着《国立学校设置法》的公布，于同年6月起步的新制国立大学中，与农学有关的学部在24所大学中有26个学部。从旧帝大过渡的有5所大学（北海道、东北、东京、京都、九州），从农业专科学校升格的为19所大学。还有，以后在国立大学新设农学部的有名古屋（1951）、弘前、佐贺（1955）三所大学。此外，在6所大学中还看到公立的农业专科学校向新制大学农学部乃至农业单科大学过渡以后又移交给国立大学农学部的实例。就私立大学而论，有东京农业大学、日本大学农学部由旧制向新制过渡，而且由于发展地区产业的需要，在各地还增设了一些新大学。于1949年起步的与农学有关的新制大学如第1表、第2表所示。